

## 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

○ 陈立柱<sup>1 2</sup>

- (1.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2.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通过比较分析淮河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三个地域文化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淮河文化研究整体上力量弱、成果少、影响小,亟待加强;一些人提出的“中国的两河(长江、黄河)文明”说似是而非,存在剿袭中亚“两河文明”说之嫌疑,所总结的两流域文化特点也未足以概括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实际上阐发中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如管、老、孔、墨、庄、孟、韩非子等都出生于淮河流域,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即道德本位意识、天人合一取向与和谐融通精神是在淮河流域阐发的,淮河流域才是“中国文化的中原”;过去讨论淮河文化研究的动因有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未能为人所注意,即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化复兴之需要,淮河流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与代表具有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淮河文化研究需要提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进行。

(关键词)淮河文化;研究现状;比较认识;国家文化战略

“淮河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快30年了,考古学者提出的“苏鲁豫皖”考古课题即淮河流域的考古问题也近30年。<sup>(1)</sup>过去好讲三十而立,淮河文化研究三十年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与其它的地域文化研究相比有什么特点与不足?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的反省与检讨来认识。

另一方面,学术界质疑“淮河文化”概念能否成立的声音一直不断,特别是一些学者积极倡导“中国的两河文明”,即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而将淮河文化分解于两大文化之中,这也让我们感到有必要在三者的比较中认识淮河文化的价值之所在,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对于中国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础与基本精神的理解

---

作者简介:陈立柱,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与认识。

还有,淮河文化研究的实际意义也为一些人所不理解,甚至质疑。比如一些来自淮河流域地方经济与文化建设的一线工作者,他们接触不少地方上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陋习,尤其是宋元以后形成的“贫困文化”,比如不重扩大再生产,有钱就吃吃喝喝了事,民风粗悍,轻死而易斗,不重乡土,穷则逃逸,安贫乐道与替天行道等等思想习俗观念。<sup>(2)</sup>因而认为淮河文化研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以上情况表明,总结与反思淮河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了。

对于淮河文化研究现状的总结,学术界已做了一些工作,像吴海涛<sup>(3)</sup>、张崇旺<sup>(4)</sup>、朱正业<sup>(5)</sup>等教授都有一些梳理。不少考古学家如高广仁<sup>(6)</sup>、杨育彬<sup>(7)</sup>、王吉怀<sup>(8)</sup>等很多学人也曾就淮河流域考古学的发展提出“淮系文明”或曰“早期淮河文化”的概念。多年来我们先后也做过一些淮河文化基本内涵的分析、梳理,以及一些会议的综述评论。<sup>(9)</sup>本文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淮河文化研究的三个方面进行反思与考量。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 一、与黄河、长江文化研究之比较

长江、黄河文化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用组织规模大、研究成果丰、著名学者参与多、形成全国性研究组织与机构来概括。如黄河文化研究中,1994年就出版了由著名学者、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担任主编的《黄河文化》,对黄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地理基础、发展历程与主体内涵做了基本的概括。<sup>(10)</sup>也是这一年的3月,“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研究会有自己的大型网站,各相关省区都有分会,在国内外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调研、学术研讨会、信息发布会等。学会“不仅大力弘扬黄河文化,还着重为扩大黄河流域对外开放,促进黄河流域与国内外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科技扶贫,规划地区经济发展,力图使该会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活跃的平台。”<sup>(11)</sup>现任会长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原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晔。而以黄河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会,沿黄多个省市与地方部门都有,如各省黄河文化研究会、黄河文化方面的研究机构等。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也经常组织。河南大学建有国家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持续性推出各种形式的黄河文化研究论著与会议。长江文化研究中,重要者如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上下册,70余万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季羨林总主编、包括李学勤等十多位著名学者担任副主编与系列主编、海内外200多位学者参与的七大系列50余种2000多万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1995年陆续出版。相近的还有如由许多著名学者担任主编、中国长航领衔编纂的八编64卷2000多万字、6000余幅珍贵图片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等。至于《长江文化论丛》《长江文明》(以书代刊)、《长江论坛》《长江日报》等等,则为持续性的学术与宣传报刊杂志。《东南文化》等

一批杂志自 1991 年也开始设置“长江文化研究”专栏。<sup>(12)</sup>其它各种形式的长江文化学术讨论会还有许多,不赘述。

与黄河、长江文化研究的情况相比,淮河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弱爆”了。首先,至今研究淮河文化的学者很少,主要限于安徽省境内,河南、江苏只有少数学者积极参与,研究力量分散,各自为战,安徽省社科联牵头组织了八届以淮河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了会议文集,安徽大学学者出版了《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相关的项目只有几项,没有长江文化、黄河文化那样多而系统的研究成果以及重量级的领衔学者。其次是没有建立淮河文化区域性特点的知识系统,即至今没有一部系统的淮河文化史、淮河流域发展史,没有一部全面汇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淮河文化概论或通论之类的书,也没有正式出版一套淮河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研究丛书(个别地方编辑的淮河文明丛书学术性较弱),纯粹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每一年虽有不少文章发表,但多是就个别问题发表议论,较重要的综合性研究论文很少。再次是没有统率全区域的研究机构,专门的淮河文化研究机构只有安徽省淮河文化研究会以及一些地方高校组建的淮域地方文化中心,而开始出现的一些相关研究机构所做的工作很有限。四是淮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充分的阐发与重视。

淮河文化研究滞后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即“中国的两河(黄河、长江)文明”观念(详下)的影响,它分割了淮河地域文化的内容,又影响了人们进一步研究她的兴趣,即对淮河文化研究形成“遮蔽”。再是学科动力不足,就是淮域考古学的一些重大发现较晚,历史学研究也甚薄弱。还有就是淮河文化本身“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特点与其地理位置适置黄河长江之间等也相关系。限于篇幅,有关情况不在此里细说,可参看我们已有的相关讨论。<sup>(13)</sup>

比较淮河、长江、黄河文化研究的情况,让我想起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蓄淮刷黄,因为黄强淮弱,结果造成淮河下游淤积加大,主河道为黄河河水占据,淮河来水以后被迫向南走入长江,从而失去自己的主河道,淮河流域被黄河、长江流域分解了。今天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研究中,很多人也是把淮河流域发生的历史文化事项算作自己流域发生的情况,而地域范围则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要把淮河流域加以分割,从而将其归入自己的地域文化范围之内。如很多长江文化的研究者将建国于淮北、迁徙于淮河之滨寿县的蔡国考古文化内容都算在长江文化的内容,<sup>(14)</sup>道家思想更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思想代表。<sup>(15)</sup>这样一来长江文化的范围实际上就到了淮河以北数百公里与黄河大堤不远的地方。而一般黄河文化的研究者也是将道家思想作为黄河文化之重要内容的,生活于淮泗地区的孔子孟子更是黄河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了。<sup>(16)</sup>

学者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人长期以来把淮河流域看作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即不承认有一个可与长江、黄河两流域相并称的独立的淮河流域、淮河文化是重要的因素。可是当我们将代表性地域来看中国文化形成的道路与特点时就会发现,正是在淮河流域出生之先秦诸子阐

发的历史文化精神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并且影响至今。

## 二、淮河文化的独特性与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

### (一) 长江、黄河文化的特点与“中国的两河文明说”问题

先看看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特点。这方面近年来研究的比较多。如李振宏等人认为,黄河文化“具有起源早,成熟快,政治色彩鲜明,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等文化特色。”<sup>(17)</sup>安作璋指出,“黄河文化长期居于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代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sup>(18)</sup>王进等认为黄河文化的“政治”与“宗教”特色鲜明,相比较长江文化则“文化”的意味浓厚,“鬼神”特征显著。<sup>(19)</sup>李学勤、徐吉军认为黄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长江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经济文明。<sup>(20)</sup>朱世光说“黄河文化雄浑威猛厚重朴实”,可以概括为“龙文化”或“土文化”;长江文化“灵巧清秀色彩斑斓”,可以概括为“凤文化”或“水文化”。<sup>(21)</sup>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所在地长期地处黄河流域,导致黄河文化政治军事与宗教特点较明显,其文化特色以“政教为主”。而长江流域大部分时间里不是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而是中原王朝经济上攫取的对象,其鬼神信仰与注重事功经济的特点较显著。

那么,这些归纳出来的长江、黄河两河文化特点能否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或者能否把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呈现出来,比如中国文化以道德为本体、人性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这些已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方面,在学者们总结的长江、黄河两河文化精神中能否展现出来?长江流域横跨十一省,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长江主干道有6300多公里,黄河流域也跨越九个省区,面积70多万平方公里,它们上下游文化差异极大,学者们所总结的长江、黄河文化特点,应该说都是大而化之的论说,多数时候是中下游地区的情况,这些文化特点的概括目前看来还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思想文化与精神特质方面。

还有,就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地区考古学的迅猛发展而提出的“中国的两河文明说”。其时一大批过去所不知道的早期文化遗存被发现,尤其是长江流域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揭开了早期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大貌,这让学者们兴奋不已,很多人提出长江流域也是和黄河流域一样的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即中国古文明不限于黄河流域一地。于是考古学领域不断有人倡导“中国两河文明(化)”说,或中国文化是由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二元耦合”的。<sup>(22)</sup>不仅一些考古学者大为倡导,一般研究中国文化的学人很多也接受了,并加以宣扬。

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对于理解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大家对于早期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远古以来即是如此。长江流域考古大发现对此无疑是一个突破。不光是长江流域,东北、西北、南方、北方等地的考古学发展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各地

早在四五千年以前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考古学家苏秉琦因此提出的“满天星斗”说,<sup>(23)</sup>张光直则有“相互作用圈”论等,<sup>(24)</sup>都是对于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文化发展状况的理论表达。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中国各地生活着的人们都建设出了自己的地域文明,发展自己的文化创造,有的人甚至认为各地都建设出了自己的“王国”,各地已经发展到地方古国或王国的阶段。因而历史文化研究也要重视这些被湮没的上古文化。

不过,“中国的两河文明”说听起来就知道是借鉴了西亚的“两河文明”说,即在两河流域间的新月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发展出来的文明,是西亚也是世界最早的文明。这里古代的时候是南北东西很多民族的“走廊”,来来往往的人多了,就出现了最早的文明。而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面积广大,上中下游的文化差异巨大,而两条河流域之间,与西亚的两河汇为一体也根本不一样,因此借用“两河文明”的概念来说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精神也不一定合适,有人就提出“中国的‘两河文明’说”存在问题,“需另有个说法”。<sup>(25)</sup>

(二) 主要产生于淮河流域的先秦诸子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与基本方面

淮河流域早期文化的发展,过去不是很清楚。所以考古学研究者多将河南的淮河流域与泗水流域归于黄河流域范围,而将淮河两岸及其江淮之间算作长江、黄河两流域的过渡地带。但经过近四十年来考古学者的艰苦努力,淮河流域的考古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者明确提出“苏鲁豫皖”考古问题,也即是淮河流域考古问题。又经过近些年来研究,淮河文化的早期情况已可看得真切。据高广仁、邵望平等人的研究,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淮河流域确实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系统,它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系统呈三分“天下”之势。这一文化系统的主源是裴李岗文化,同时地理上的中介性使淮河文化对黄河、长江史前文化又具兼容性。淮系史前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以贾湖文化、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年代约在公元前7500—5000年。第二时期是淮系文化普遍发展的时期,也是裴李岗文化在淮河流域史前文化形成过程中呈现主源性作用的时期,时间为公元前5000—3500年,这一时期出现明显的文化互动现象,即已开始了族群的迁徙。第三阶段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代表,时间为公元前3500—2600年,其时黄、淮、江三大流域史前文化面貌开始迅速地趋同,表现为社会变革的同步进行,各地区间和平、非和平互动的加强,发生了大规模的族群重组与迁徙,在淮河流域有率先进入文明的良渚文化北上至淮河以北的遗存,而大汶口文化人的迁徙影响使淮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地方性文化类型。第四时期是龙山文化时代,时间为公元前2600—2000年,社会大分裂进一步深化,迁徙过程更加频繁,淮河流域文化遗存普遍增多,进入了早期文明时代。<sup>(26)</sup>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淮河流域形成了裴李岗文化为主源的文化特征,后期则进入文化族群迁徙互动的时期,本地区开始成为四

方文化风会互动之地。淮系文化各部分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才被分别命名;但总有几个连接点把它们直接或间接地罗织成了一个松散的文化大系。例如,他们多有三足器、圈足器、小口双耳壶,大石铲、石镰、磨盘,发达的骨角蚌器,有多人合葬、二次合葬、以龟为灵、以犬为牲等的特殊习俗,很容易与以平(鬲)底盆、钵、大口罐、尖底瓶、绚丽的彩陶为突出特征的仰韶文化系统相区别。<sup>(27)</sup>

确认淮系文化是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大系并存发展的另一大史前文化系统,当然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她使原来附属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淮河流域,在文化源头上终于获得与之并称的地位。苏秉琦先生很早已指出,“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淮河流域史前文化有自己的源和流,有自己的古代文明和发展规律。”<sup>(28)</sup>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进入三代以后,淮河流域就成为西部华夏文化与东部夷人文化的交汇融合地区。夷人信鬼而仁厚,所谓“夷俗仁”;<sup>(29)</sup>而西部的华夏人则强武而尚忠,多数时候是西部的华夏部族向东部扩张,少数时候,如大汶口文化一度扩张至黄河上游地区,进入中原的中心。多数时候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淮河中游地区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相互影响,造就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早期基础。尧舜禹时期政治上开始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夏是西方部族,成为中原“共主”意味着西部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商是联合东方夷族势力取代夏的,商族成为共主则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融合。与此同时,夷族部落“分迁淮、岱”。周人东征进一步加剧夷族南下江淮。春秋时期,四方诸侯崛起,不断向地处中央的淮河流域发展,分布于淮河流域的夷族小国深受大国欺凌与兼并,成为西南荆楚文化、东北齐鲁文化、中原王朝文化、北方三晋文化、东南吴越文化等五方地域文化的交互中心,淮河流域成为以夷文化为底色而深受多种文化影响的文化交汇地区。<sup>(30)</sup>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文化最早的阐发者必然出乎其间。老子生于淮河中游的“曲涡间”<sup>(31)</sup>,他目睹大国对于小国的欺凌与兼并,也受到中央王朝文化的影响,以夷文化慈、俭、谦下为出发点,而将各种文化融会贯通,创立了“代弱者立言,发道德精微,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后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老子对于思之本身的研究,将中国的形上思考总结为“以道观之”,上升为通透的智慧,所谓“道通为一”。<sup>(32)</sup>到战国末期道家学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至汉初则以黄老道学面目成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普及于全国了。孔子为泗水之滨鲁人,鲁国是周礼文化与商夷文化会合的地方,孔子在这里体验到周礼的文明与夷人的仁厚,提出“克己复礼为仁”,<sup>(33)</sup>从而将周文化与夷文化融会贯通。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信。还有发扬兼爱、名鬼、天志精神的宋人墨子,其学说影响宋楚齐鲁而为秦国所实践,大大推动秦的强大与统一全国。<sup>(34)</sup>此外还有管子、列子、韩非子、宋钐、惠施、孔子之多数弟子等等一大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出生于淮河流域。便是生于赵国的荀子,也要到淮河流域国家发展才会成就其博大的学问。<sup>(35)</sup>可以说正是淮河流域这方土地成就了中国文化代表性巨人的事业,而四方风云汇聚之地、诸国文化会合之区正是其成功的秘诀所在。可以看出,早期

中国融合为一的历史与道德本位的文化主要是淮河流域出生的学者总结、阐发的,淮河流域文化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是由其地理、历史与文化的多种因素决定的,中国中东部核心地带的位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比较黄河流域“政教为主”、长江流域“经济特色”鲜明的情况,淮河流域“思想文化”的特色是很突出的,尤其是在中国文化精神形成的阶段。所以谓之“中国文化的中原”可谓恰如其分。

### (三) 再说淮河流域、淮河文化的独特性问题

这个问题,前面提到的我们几篇文章做过一些讨论。淮河流域古代是和黄河、长江一样独流入海的“四渎”之一,古代的《水经》及《水经注》对其水系与人文地理有过系统的描述。<sup>[36]</sup>到了南宋以后黄河南泛,夺淮入海,迫使淮河改道自长江口入海,淮河水系出现紊乱,直到1855年,黄河再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海,结束了近700年夺淮入海的历史,但是淮河水主要从长江入海的局面未能改变。今天我们所说的淮河流域是以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域范围为依据,包括淮河水系与沂、沭、泗水系,后三者古代一直都是淮河的支流,总面积有27万多平方公里。<sup>[37]</sup>这一地域西部、东北部为山地,在这两者之间为平原丘陵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各个部分就存在着不断地迁徙、交往、融合的情况,以后时期各个地方因为内部水陆交通的便利来往更加频繁,我们说的淮河文化就是形成于这一地域之上的历史文化。这一地域的文化各个地方各个时期自然有其地方性的特点,如古代的汝颖奇士、谯沛俊彦、邹鲁儒士、涡淮道家等等。一般而言,一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土地上,如果长期有州郡一级的常设机构持续存在,几百年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自身特点的地方性文化小区域。典型的如以合肥方言为主所体现的合肥文化、以融汇南北风味为主的信阳文化,等等。再扩大一些,今天的淮河流域有人分为黄淮区、淮海区与江淮区,既是地理上的区分,也有文化上的分别,有学者就从音乐特色上将淮河流域的民俗音乐区分为以上三个音乐区。河流本身是流域为一整体的要素,它的流动犹如网线而将整个流域串为一体。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常常因为这些网线而有所往来、加强了联系。这就使流域的内在一致性成为可能。越是小的流域,内部的联系就越强。相比较,黄河流域有70多万平方公里,<sup>[38]</sup>长江流域有180万平方公里,从上游到入海都有数千公里,其间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比之淮河流域内部的差异不知要大多少倍,学者们仍然可以提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概念,并且加以讨论,得到认可。<sup>[39]</sup>相比之下,淮河流域内形成的文化内部一致性无疑要大得多,“淮河文化”概念的成立当然没有问题。<sup>[40]</sup>这是从一般情况上讲。淮河今天从长江口入海,像是长江的一个支流了,东北部的泗、沂、沭水系也不再流入淮河主干道而独自入海了。但是“淮河流域”的概念依然存在,国家设立了与长江、黄河等一样的“淮河水利委员会”,专门管理包括泗沂沭水流域在内的整个淮河流域的水资源问题,淮河流域依然是中国著名的大流域之一,就是因为数千年形成的淮河流域的观念深入人心,换一种说法即淮河不仅是一条自然河,更是一条历史文化的河

流。

对于淮河流域文化具备整体性特质表示质疑,主要是一些学者看到淮河与西边的秦岭构成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交通方面南方行船,北方车马,饮食方面南方以米为主,北方面食居多,地理气候方面,北边平原为主,属于暖温带,南方山地丘陵居多,属于亚热带气候,古代即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sup>(41)</sup>的说法。如此等等,南北不同,淮河流域只是一个过渡。

其实有人在此过渡,如果这里足够广大,过渡的时间足够长,兼而有之形成自己的特点尤其有可能。前言西亚的两河流域就是走来走去的人多了,走出世界最早的文明。过渡性同时意味着兼而有之,这就为兼容并包、融会贯通提供了条件与可能。能达到融会贯通,才能从中总结出“道”来。看先秦诸子的思想文化特点,“道”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各家各派无不如此,各有其“道”,但能达到“道”层面的认识,必须要能贯通,所谓“道通为一”。是以大家都强调“通”,即通士、通才、通知、通有……,以后还有“通儒”的追求。通达了,贯通了,道就显现出来了,或者说就达到了。所以兼有同时意味着具备兼容性,物质层面的兼有,进入思想方面或说精神层面意味着共通性的认识,即从形而下进入形而上,也就是生气相通而有气质的变化,气质的内容就是文化了。所以文化是在共通性的层面展现出来的。而这一切的基础即是兼而有之。淮河流域作为四方风物、文化汇聚之地,正是先秦诸子能集中出现于此的基础。

大体言之,淮河两岸是南北方物产并有,也是早期中国四方各族群交汇、趋向之地,意味着兼而有之。所以仅仅把过渡理解为没有个性,或者说只是某一方面的部分,都不符合淮河流域的实际。正是这种兼而有之、融会贯通的品质,造就了中国文化道通为一的特质,融会贯通的能力,生生不已、抟成趋大的品格。很早的时候淮河流域就具备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条件,所以其思想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成熟,以后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也是个性鲜明、独具特色。老子、墨子、孔子等淮河流域产出之诸子思想的成形,同时意味着中国文化主要精神的具备。其实,淮河之“淮”字音义变化与定型的历史过程,本身也是兼而有之、逐渐形成的,颇有淮河文化一般性特质。淮,最初读如“隹(zhuì)”,几经变化到中古以后转读为 huai,其间正是东方夷人的“隹”音在中原华夏“汇(匯)”声的影响下,又在秦汉学者均分与会合南北的诠释中逐渐完成了转变。淮者汇(匯)也,汇通中华大地生灵创造之精华而成中国文化之大体也。“淮”字的音义变化正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和谐融通精神与人性道德本体的集中体现。<sup>(42)</sup>

### 三、进一步反省“淮河文化”研究的背景因素与未来战略

#### (一) 研究背景的新认识

反省总是要先回到它的起点,即思考它何以会出现。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sup>(43)</sup>就是这个道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起源意味着本质”,必须检讨淮河文化研究何以兴起的动因。

过去我们讨论淮河文化研究的动因主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发展的需要;二是历史与考古等学科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促成,是这两个因素促进了淮河文化研究的提出与展开。今天看来这种认识存在着局限与不足,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需要研究淮河文化,但是对于淮河文化的实质或真实价值认识不够,以至于今天有人要怀疑这种研究的实际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的趋势,这对文化建设提出了要求,不少地方一线文化工作者较早体会与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淮河沿线如河南的信阳市、安徽的蚌埠市、江苏的淮阴市(今淮安)等地大略同时都展开了淮河文化的研究,并且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蚌埠市的淮河文化广场,淮阴市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淮滨县的中国淮河文化博物馆等,可谓是最直接的体现。但是如同我们上面所讲的,淮河文化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她的繁盛时期在先秦到北宋时期,以后走了下坡路,因为天灾人祸等因素而形成了上文所说的“贫困文化”。这些在今天还有不少残余。所以我们今天在淮河流域直接感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社会以理性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观很多是相矛盾的,或者说不利于现代发展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换一种说法即现在淮域的民俗文化存在很多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苏鲁豫皖四省淮河流域部分都是所在省区最落后的,深层原因即在于此。所以研究淮河文化一方面要注意到她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导地位、融和汇通的特点与道德本体的取向,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当下社会以经济与科技为基本取向的价值观念与她的不一致性。所以研究过去的历史文化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既要注意到过去文化的本质特征、变化情况,还要看到现实发展与其精神气质是否协调一致的问题,不能一味地认为凡过去的文化都能对现实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有的可能会起相反的作用。<sup>(44)</sup>

第二方面即历史与考古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一些成就,特别是考古学也有一些突破,比如新郑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淮北石山子遗址,怀远侯家寨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淮安青莲岗遗址等重大遗址都已发现。但是研究没有真正展开,尤其是不少学者把裴李岗文化当作仰韶文化的主要源头,即把它同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结合起来看,从而早期淮河流域文明的重要性未能为大家普遍关注。还有就是夏商周三代中国西部华夏族文化与东部夷族文化(也有南方的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接触、交汇、融合的历史也少有人作深入的研究,而这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特质形成的关键。所以说我们虽然注意到历史与考古学的发展,但对于她之重要意义的认识非常不够,甚至存在错误。这些对于我们认识淮河文化的重要性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两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更重要的深层次的方面尚未被注意到,就是中华文化之复兴及其对于世界之责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即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问题。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对于世界应有更大的贡献。”毛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很早即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快速发

展而凸显出来,过去却是不太明显的。其实,一些国外的有识之士很早也认识到这一点。1975年李约瑟指出“现在该是我做总结的时候了。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在日后指引人类世界,做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再再说一遍,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sup>(45)</sup>

那么,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参考与借鉴,或者说是中国文化之可担当。具体内容当然是多方面的,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是主要的:

一是中国文化以“道法自然”为宗旨,与自然一体,倡导人与自然相和谐,承认人与自然是融合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深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指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相信“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所谓“上善若水”,所谓“逝者如斯夫”,都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向自然攫取,强调战胜自然。中国的山水画,中国思想与文学对于自然质朴的追求等等都是具体的表现。总之,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倾向在世界上是比较突出的。也因此,当代中国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张。

二是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意识,强调“道生之,德蓄之”“一切止于至善”“致良知”。西周时中国开始走向道德主义的认识论,周人认为天下是有德者居之,周之所以能取天下,乃是文王等的道德行为感动上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道德仁爱角度阐发其思想的主要方面成为道、儒、墨等主要学术流派的共同特色。即便是历史著作,也是强调道义为先,人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做人更根本,所以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之历史主义取向成为中国史学的正宗,即“正史”。

三是中国文化的和平主义取向,对于西方普遍主义思想产生的“文明冲突”思维,无疑是一剂良药。早在尧舜时期中国先人即以“协和万邦”的原则处理国族间的关系,以后时期“兴灭国,继绝世”成为中国各个部族邦国之间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地处淮河中游地区的宋人两次提出“弭兵”的主张,也是唯一提出弭兵的国家,希望大家和平地相处,不要总是武力相向,这些后来被学者们总结为“和为贵”“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之所以对于人类未来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正在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科技文明在今日没有节制的发展,和平建立在不断扩大的核威慑基础之上,人类正被带向一个充满灾难、前途渺茫的未来。就像霍金最近所指出的:“今天对于人类的威胁,绝大部分来自科学进步。”而中国文化追求“和为贵”,要把社会和谐建立在和平共处、相与为厚的基础上,重视德性教育与建设,提倡自然主义,追求“和而不同”而不是“文明的冲突”。<sup>(46)</sup>这些主要都是在淮河流域阐发与提升的,也是淮河文化的主要内容。所以淮河文化与中国文化精神之间比其他地域性文化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从而,淮河文化之兴衰与中国文化的兴衰密切相关,她的复兴某种意义上即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淮河流域曾是文化与经济发达之地,后来落后了。最近60多年来没有多少大的洪灾,更不再是南北争战的战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淮河流域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水

平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反而和其它地方拉开了距离,为什么?其中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可能是深层因素,即“贫困文化”影响了人们理智地面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淮河流域文化研究、社会发展与其未来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即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衰落是过去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与走向没落的一面镜子,重新铸造新时代的淮河文化也将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意味着我们对于淮河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淮河文化研究相比较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研究,成果较少、影响不够大,甚至整体水平偏低,不能说与此没有很重要的关系。因此,深入认识中国文化,明了中国文化何以如此,必须下大功夫研究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与文化遗产。

## (二) 研究战略的新思考

反思长江、黄河与淮河三个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让我们对今后的淮河文化研究有了一些新想法。

1. 充分利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实施新发展的战略机遇,寻找适合淮河流域自身发展的道路。淮河流域只有在自身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文化问题才能得到更好地解决,而更好地发展,这就需要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道路。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讨论。简单地讲,发展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与文化事业、产业,是淮河流域可以做好也符合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大形势需要的。淮河流域过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步履艰难,就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现在苏鲁豫皖四省之间要建立在国家统一安排下的合作发展机制,而国家也需要从发展农业与文化的视角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作为研究者,要通过淮河文化与流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向国家提出淮河流域发展的新战略。通过合理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促进淮河流域的新发展,为重建或者说改造提升淮河文化奠定基础。

2. 通过研究,深入认识淮河文化的重要意义,认识中国文化精神根源于淮河流域这块土壤,中国文化之复兴,首先的工作就是对于淮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精神特质之必须。在此基础上将淮河文化研究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考虑。因此对于淮河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特征,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中国历史文化之关系,淮河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文化再造之重要性等等,都要有深入具体的研究。简单地讲,中华民族早期走过的道路是由淮河流域出生的学人总结的,文化形成的道路很重要,意味着文化的根性所在;中国文化的道德本位意识也是淮河流域出生的学人阐发的,这些学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是因为淮河流域夷族“仁”文化的底色,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总结就走向了以道德为本位、以人性为关怀的道路。如此,淮河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可分离之关系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必须要有对于淮河文化的深入反省,即对根性的发掘,也需要通过淮河流域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来体现,这也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因此将淮河文化研究提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层面加以考虑是必须

的。

3.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提出几条具体建议。一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研究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纲要文本,成立全国性淮河文化研究机构与研究基地,甚至可以建设专门的学院,有计划地也是深入地发掘、研究淮河文化历史发展及其基本方面;二是由国家出台有关淮河文化研究战略,研究淮河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内在联系,总结提炼(早期)淮河文化的精神实质,如和平、和谐的文化追求,道德本位的生命存在意识,融会贯通的思考方式,分析后期淮河流域文化与发展缓慢之间的内在关系;三是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形势认识淮河文化或者中国文化核心区域的历史与发展问题,寻找适宜于淮河流域发展的新道路。淮河流域在新时期的发展与复兴,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与再创造。

#### 四、结 语

1. 《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汉书·地理志》也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淮河流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南接长江北邻黄河,曾经是四方文化风云际会之地,易得风气之先,是以有才人出,吸纳古今,包吞万有,融会南北,贯通天人,推陈出新,创发天地人伦之大道而为中华文化之精粹。管、老、孔、墨、庄、孟等中国文化之代表人物生于斯而不是生于偏南的长江流域与偏北的黄河流域,正由于此。而淮河之“淮”字的音义变化与定型也从一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淮河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2. 中国文化基本方面可以用“道、德、礼、义、信、仁、通”诸用语来表示。具体言之:道为中国思维方式之立场与方法,通则为中国学问追求之境界,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礼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形式,信则中国文化所取之精神,义为中国文化之旨归,而仁就是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了。这几个方面大都是在淮河流域的土地上生成成形并获得阐释的。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不以知性或科学为基本追求,而以德性与人性的自然关怀为主要旨趣,到了今天它自然就成为科学文明过度发展的一剂良药。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尽管有式微之情势,但是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深契于人性的根底,将有如老子之思想,玄而不虚,隐而后彰。

3. 大体言之,中国文化早期存在着夷夏东西的对立与交合,交汇的中心即在淮河流域。期间淮河流域产生的学人将东西之异会合融通,发扬光大,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而后淮河流域与其文化又在中国南北重心转移中发挥起承转合之作用,尽管自身因为天灾人祸而出现了凋疲的情况,但自长远看其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枢纽地位不会因此而改变。

4. 一种观念一旦形成,改变它是不容易的。“中国的两河文明(化)”说今日正其昌盛之时。但是虚幻的迷雾一旦为阳光刺破终将会烟消云散。我们相信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淮河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未来意义必然会得到世人的认

可。当然也需要我们大力的发掘与阐扬。今天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体制大改革,可以说为淮河文化的研究与发扬鼓足了东风。长江、黄河文化的研究与其特点的总结,以及和国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将淮河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我们相信,中华文化真正复兴之日即是淮河文化再次昌达之时。

### 注释:

(1)“苏鲁豫皖”考古问题即淮河流域考古问题,80年代由苏秉琦等考古学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1987年正式开题,参见《苏鲁豫皖考古座谈会纪要》,《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1991年。

(2)关于“贫困文化”的内涵,可参考辛秋水、吴理财《文化的贫困与贫困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要为流域经济发展服务》,《学术界》2004年增刊《文化再造:淮河流域发展的新视角》,《咨政》2005年第19期。

(3)吴海涛《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4)张崇旺《淮河文化研究》,《安徽年鉴》,安徽年鉴社出版,2010、2011、2012、2013年。

(5)朱正业《近十年来淮河流域经济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6)有关“淮系文明(化)”高广仁先生有一系列论著,代表作可参考其与邵望平合作文《试论淮系史前文化及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燕京学报》新十七期《淮系文化的早期发展与三代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7期。

(7)杨育彬、孙广清《淮河流域古文化与中华文明》,《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县文化局《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9)陈立柱《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学术界》2004年增刊;陈立柱、纪丹阳《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8期。

(10)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年。

(11)“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暨第七次理事会”议程,参考“黄河文化经济网”。

(12)《长江文化研究》专栏编辑按语《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3)陈立柱、洪永平《浅谈“淮河文化”概念》,《学术界》2006年第4期《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安徽史学》2008年第3期;陈立柱、吕壮《古代淮河多种称谓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

(14)万绳楠等《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年。

(15)如陈剩勇在《长江文明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辑五册“总序”中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已经贡献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及孙武、范蠡、屈原等一大批思想家。两汉时期的长江流域,前有《淮南子》为代表,以黄老之学为表征的新道家,适时地矫正了秦朝‘以法为教’的法家暴政的意识形态”。

(16)这方面的情况较多见,不详述。

(17)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

(18)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史哲》1992年第4期。

(19)王进《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之比较》,《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20)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81页。

(21)朱士光《论区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流域文化研究——以长江文化为例》,《历史地理》2004年第20辑。

(22)据我的初步考察,“中国的两河文明”说较早由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他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刊发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我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

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文化。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梁的著作大量借鉴于日本人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 1900 年撰写的《支那学术史纲》,也就是说早期“中国的两河文明”观念可能来自较早学习西方学术方式研究中国学术史的日本人。参考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夏晓红《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刘玉堂《长江文化及其研究概论》,《长江论坛》1996 年第 4 期;陈尧明、苏迅《长三角文化的积累与裂变——吴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江南论坛》2006 年第 5 期。

(2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89 页。

(24)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 年。

(25) 唐晓峰《中国的“两河文明”》,《中国国家地理》2001 年第 4 期。

(26) 参考高广仁、邵望平《试论淮系史前文化及裴李岗文化的主源性》,《燕京学报》新十七期。

(27) 高广仁《淮河史前文化大系提出的学术意义》,《郑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28)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1978 年第 3 期。

(29) 范晔《后汉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 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汉小学四种》本,巴蜀书社 2001 年。

(30) 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 年;陈立柱、洪永平:《淮河文化概念之界说》,《安徽史学》2008 年第 3 期。

(31) 酈道元《水经注》,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553 页。

(32) 《庄子·齐物论》。

(33) 《论语·颜渊》。

(34) 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光明日报》2011 年 6 月 3 日。

(35) 荀子年十五以后即在淮河流域问学、讲学、著述,后在楚国担任兰陵县令,也死于其地。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386-387 页。

(36) 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淮水注》,陈桥驿《水经注校证》本。

(37) 中共安徽、河南、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合编《治理淮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年。最近,中国科学院学者利用遥感重测淮河,认为源头在河南嵩县车村镇东沙沟,淮河实际长度为 1252 千米,面积为 274657 平方公里,参《中国科学家重新确定淮河源头》,新华网 2012 年 11 月 9 日。

(38) 黄河流域位于北纬 32°至 42°,东经 96°至 119°之间,西起巴颜喀拉山,东临渤海,北界阴山,南至秦岭,东西长约 1900 公里,南北约 1100 公里,流域面积为 75.2 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三个英国的国土面积。若包括鄂尔多斯内流区面积,则为 79.4 万平方公里。黄河的河段长度和流域面积,因泥沙淤积,河口不断延伸而处于持续变化之中。

(39) 参见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116.8 万字),华艺出版社,1994 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三册,170 余万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上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

(40) 陆勤毅《淮河文化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2014 年 9 月 15 日。

(41) 《晏子春秋》卷六。

(42) 陈立柱、吕壮《古代淮河多种称谓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11 年第 11 期。

(43) 《老子》第十一章。

(44) 陈立柱《安徽淮河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省思》,《安徽日报》2014 年 9 月 15 日。

(45) 《李约瑟文集》(中译本),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年,第 341 页。

(46) 陈立柱《如何看待人文主义与世界和平问题》,《江淮论坛》2002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